

DOI:10.16124/j.cnki.cn13-1390/c.2023.03.001

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批判维度

匡存玖, 陈俊雯

(四川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东欧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社会实践、人道主义和结构功能等不同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重视社会交往与实践的批判,关注符号意指的语义性解读,把握结构功能的运行机制,建构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独特阐释风格与批判范式。全球化、符号化背景下,认真检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成果,可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一个良好的参照。

关键词: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批判维度;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23)03-0059-08

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层面回应日益繁盛的符号学思想,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之间发生过大量碰撞、交流,形成了异常丰富复杂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思想,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世界符号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深入当代资本主义现实问题、审美现代性和日常生活领域,注重从社会实践、人道主义和结构功能等不同理论维度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重视社会交往与实践的批判,关注符号意指的语义性解读,把握结构功能的运行机制,建构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独特阐释风格与批判范式。本文着重讨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批判维度,辨析其理论价值优劣,力图为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提供理论参照。

一、实践、社会、交往等维度的符号学美学批判

东欧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回应20世纪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符号学思想时,注重揭示符号形式、结构、意指及意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基

础,比如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基于实践建构的辩证意义理论,波兰的沙夫基于语言与社会交往提出的交往符号学理论,沃伊茨克基于实践提出的信息最优化理论,匈牙利的赫勒基于日常生活提出的交往美学思想,都与破解东欧现实困境并为其寻找出路紧密结合,集中体现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关注社会、实践与交往的理论批判风格。

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科维奇将实践视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核心理论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辩证意义理论。对此,傅其林指出,“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意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对符号意义与交往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切入到当代社会和谐的文化思想,根本上来说是确立意义的社会规范基础问题”^①。在马尔科维奇那里,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符号则是人类实践的特殊形式,产生于人的实践性存在与自由创造。“实践”是人类实现其生命最理想的活动,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消除误解,实现有效交往,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行新的物质生产及意义生产,到达哈

收稿日期:2022-07-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教育部人文社科2019年度青年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19YJC752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匡存玖(1980—),男,四川中江人,博士,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陈俊雯(200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

① 傅其林、贾冰:《论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美学阐释》,《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贝马斯理想中意义分享的世界。马尔科维奇对辩证意义的区分也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他把辩证与实践意义区分为六个方面,即物质生产、社会合作、符号进行运作的交往、经验创造、评价活动、自然符号与语言符号的解释等,这样就从生产、交往、创造、合作等角度,将辩证意义全面纳入了实践活动的范畴,实现了意义分析和理解的转型。应该说,马尔科维奇以实践的思维范式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现实意义,其理论内在于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交往共同体之中,强调与社会实践活动的紧密关联,区别于以往忽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纯粹符号学理论批判,超越了西方国家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学批判范式。

波兰的沙夫也把符号语义研究置于社会交往背景之中考察,建立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的符号学。安杰耶夫斯基指出,沙夫基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语言、文化和交往作用的间接表述,集中阐释其语言和文化的社会地位与重要作用,建构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模式,致力于将交往“从语言建构及其操纵中解脱出来”^①。沙夫的交往符号学建构在社会实践与符号交往基础上。他将实践视为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将社会交往视作符号学美学思想的基础,认为符号是集社会性、物质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人的产物,强调符号意义的社会性及其与个人、社会之间的交往关系,涉及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与现实的各种关系。他还对符号本身进行了重新定义:“每一个物质的对象、这样一个对象的性质或一个物质的事件,当它在交际过程中和在交际的人们所采用的语言体系之内,达到了传达关于实在——即关于客观世界或关于交际过程的任何一方的感情的、美感的、意志的等等内在经验——的某些思想这个目的的时候,它就成为一个指号(即符号——笔者注)。”^②符号成了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同时,沙夫还批判性地揭示了符号意

义生产的运行机制,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与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关系。在他看来,社会符号的意义生产应以人的理智交往为基础。但他并不排斥人的情感交往,相反,他认为符号与情感、意志等紧密关联。可以说,沙夫对作为社会实践与交往的符号的意义及功能的分析,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拓展了文化批判的视域,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相比显得更具现实意义。

同时,波兰的安杰耶夫斯基、沃伊茨克、科拉科夫斯基等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读,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理论和实践符号学。安杰耶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没有太多关于语言交往方面的直接论述,但从其认识论与本体论研究中可发现许多关于语言、文化和交往作用的间接表述,诸如他们关于“思想与存在的关系”“人类思想的独立性”等方面的论述,就蕴含了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思想。作为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和意识起源于人交往时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语言在发展进程中为探索和描绘整个世界提供了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语言也在建构主义那里成为语言暴力、意识形态控制与操控的工具。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语言变成了资本与权力的市场,人的理智及其语言被笼罩在商品与物化的“幻象”当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理论破除社会交往的意识形态化,将人的交往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与自由发展。沃伊茨克基于社会实践批判建构了实践符号学,并将其定位为一种关于人类与物质生产高效协同作用的理论,亦即信息最优化理论。他认为,现当代语言符号信息传递的有效性程度普遍比较低,为此,他构建了一套关于信息生产者和接受者的最优化适应要求,以及信息最优化的内容要求,确立了信息生产的技术、感知性、精确度、适应度、及时访问性等规则与标

①[波]博莱斯瓦夫·安杰耶夫斯基:《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的问题》,陈飞译,《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

②[波]沙夫:《语义学引论》,周易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76—177页。

准。科拉科夫斯基则从实践角度对近现代技术和理性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批判。他关注人的实践与对话,积极弘扬主体创造精神,认为认识就是基于实践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劳动对话”,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的实践产物。

匈牙利学者赫勒从哲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提出了她的交往美学思想:在哲学层面,交往是各种价值观念的桥梁,其价值在于将哲学引向各种价值观念的讨论,建构一种哲学的价值体系,创造一种多元价值共存、“没有支配的交往”的理想社会,摆脱利益的束缚而自由地选择生活;在艺术层面,交往是联系艺术真理与作品、艺术作品与接受者的媒介,能够促进艺术与文化的独立,促进情感的自由沟通与交流,有利于突破艺术自治的限制,建构实现自由平等的“多元交往美学”;在日常生活层面,交往构成了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的津梁,用爱、恨、依恋等情感交往方式沟通日常生活和社会劳动,帮助我们寻找出路,确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虽然交往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障碍,诸如“权力关系、道德困境”和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关系等,但赫勒仍然相信“真、善、美”理想社会的存在,相信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的存在。她希望基于交往美学承担起批判和建构现实世界的职责,消除阻碍社会交往的因素,从而寻找到生活的希望。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相比,赫勒的交往理论有一种鲜明的乌托邦色彩,具有很强的宏大叙事性、历史性和时代性;与沙夫的语义交往理论相比,两者有很强的共通性,都非常重视实践与历史维度的探讨,彰显了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独特批判风格。

二、人道主义、语义学维度的符号学美学批判

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注重从人道主义、语义学等角度对美学范畴作意义和概念上的多义性辨析,诸如沙夫的语义

交往符号学、科拉科夫斯基的反“异化”的人道主义符号学、施陶尔的“人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存在人类学派”的人道主义批判,以及奥索夫斯基、莫拉夫斯基、马尔科维奇的意义理论、语义学分析等,都上升到文化政治层面,克服纯粹语言学和符号学研究的片面性,突破传统理论的知识学视角,凸显了符号学美学研究的复杂性、层次性与多义性。

波兰的沙夫、科拉科夫斯基、奥索夫斯基、莫拉夫斯基等学者的语义学批判极为精彩。沙夫在20世纪50年代从语义学、语言和认知等角度切入,不断从语义学走向政治符号学研究,对以罗素、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艾耶尔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语义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这些现代西方语义理论把语言视为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把人的世界限制在语言的世界或语言实体范围之内,从逻辑形式和建构模式片面理解,无疑会导致唯心主义和认识论上的唯我论。而莫里斯的符号学思想并不单纯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而是将其上升至大写哲学领域,纳入“生物—社会自我”的社会文化关联背景下思考符号意义,包括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从中寻求人的自由创造的意义,体现了鲜明的唯物主义态度,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撑。对此,傅其林指出,沙夫的语义学理论“迥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而是以拥护人的尊严、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为标志的人道主义的意义理论,这无疑是对符号意义拜物教的批判”^①。作为波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主要代表,沙夫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来思考符号意义问题,讨论人类个体的自由价值、人类的地位命运、人的异化等问题,批判和反对生态危机和技术理性的异化,揭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超越了一般语义符号学意义理论,极大拓展了语义学批判的理论视野。此外,科拉科夫斯基也对现代西方语义哲学理论脱离唯物主义、脱离社会现实的局限性进行了深

^① 傅其林:《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学术交流》2015年第8期。

刻批判,在他看来,以埃图凯维兹为代表的波兰约定论,忽视了事实的客观性,具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特征;以皮尔斯为代表的美国实证主义,导致了科学的物理化,从而使理性走向了一种异化。奥索夫斯基对再现、表现、现实主义等范畴的语义学批判也颇为深刻,比如他把再现概念解释为图画或描写、再现对象、指示物三种关系或部分,前两者的关系属于“方法的现实主义”,后两者的关系属于“内容的现实主义”。莫拉夫斯基在借鉴萨特、麦茨、塔尔图、穆卡洛夫斯基等人的符号理论基础,将现实主义、再现、表现、模仿和引述等概念命题纳入语义学框架下分析,甚至得到新批评学者比尔兹利的首肯。

捷克斯洛伐克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等为代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从人道主义和语义学批判角度,对符号学美学进行了大量批判性研究。比如施陶尔在批判穆卡洛夫斯基“非人化”美学的同时,也阐明了自己“人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思想。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研究不能把创作者、社会历史置于研究视野之外,不能完全斩断艺术作品与社会历史活动之间的关联,否则将导致文学、美学的非人化。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有着原则上的区别,穆卡洛夫斯基试图调合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用一种定量分析、数学分析的复杂逻辑推演方法,以及形而上学、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看待文学艺术,把文学视为一门精密科学,把有历史具体性的作者个性、社会关系等变成各种超个性功能及其标志,显然没有辩证对待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真正现实,把马克思主义研究简单化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作品结构,而是研究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研究艺术作品产生及其反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包括艺术反映现实及其产生影响的方式、手段等。同时,以科西克为代表的“存在人类学派”受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影响很深,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角度深刻批判处于历史之外的结构主义的僵死凝固

性,诸如资本主义拜物教、异化劳动、文化工业、技术理性,以及本国教条式、僵化的政治经济结构等问题,追寻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寻求人的全面发展,超越了一般性语义学批判或意义批判。斯维塔克的戏剧人类学批判地讨论欧洲历史上的人类学模式和戏剧人类学模式,注重从古希腊、莎士比亚、布莱希特的经典戏剧中考察人的发展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发展,把历史上人道主义思想精髓及其传统引入现代社会,积极倡导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变化及其革命,追寻人的本真性、自由、价值与意义,体现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批判色彩。

南斯拉夫的马尔科维奇和匈牙利的赫勒也从意义和语义角度提出了大量符号学美学思想。马尔科维奇在系统批判欧美意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辩证意义理论。在傅其林看来,“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理论就是通过符号化过程的人道化,批判符号意义的异化,对抗词语的‘专政’,认为只有通过言语、符号的使用,人类才成功地创造他的社会,成功地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中与其他人群建立交往和合作联系”^①。在马尔科维奇那里,人道化的符号意义及其对交往的建构是人类理想社会的重要维度,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有批判性、创造性的解释,需要人在历史中进行自我实现,而不能脱离人与人的经验。因此,他主张建构一种更为人道的世界来实现人的本质,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使世界人道化,使人通过实践成为从事自由创造活动的存在。赫勒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张扬着一种现代或后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它关注现代性中的人的问题,注重日常生活的人道主义化,在重构美学、艺术领域的过程中,侧重考察人的本质、存在、可能性发展等现实问题,批判官僚主义,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美学。对此傅其林认为,赫勒的现代性问题“是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问题,美学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克服异化,走向好生活的一个

① 傅其林、贾冰:《论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美学阐释》,《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不可或缺的维度”^①。而且,赫勒还将人道主义批判同西方左翼激进主义、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阐发,从宏大叙事转向对个体生存、需要状态的文化关切,这使其人道主义批判倾向显得更具多元性、开放性和思想性。

三、形式、结构、功能维度的符号学美学批判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并不是纯粹地批判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观念,而是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内容与形式,实现了文本符号结构的审美性体验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巧妙融合。可以说,“形式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深刻的自我反思”^②,诸如卢卡奇对小说形式的研究,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符号学美学,丽莎·希穆涅克对音乐语义学的阐释,赫勒对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历史小说结构特征、叙事机理等的解读,都持续从形式、结构维度深化了对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解,彰显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辩证批判精神。

匈牙利的卢卡奇从形式主义美学角度系统考察了审美反映的符号机制,提出了典型形式结构、审美信号系统、审美中介机制等系列形式的符号美学概念。在他看来,“典型是现实本身的一种本质的现象形式”^③,具有形式的结构性。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典型在于“集中”,一方面,文学的结构形式及其典型集中性,与现实生活形式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审美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们采取了典型的形式和结构。卢卡奇以托尔斯泰小说为例,对其形式结构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托尔斯泰就是凭借典型结构的方法成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种创作方法必然的结果是结构往往被分解为细小的、表面上不重要的部分,然而它们彼此息息相关,而细节在里面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它们为结构提供了媒介”^④。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符号系统,它以特殊的形式结构成为日常生活与人类普遍命运的媒介;而作为一种特殊符号中介系统,文学使语言从普遍抽象的语言之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激发性的反映方式,唤醒艺术的巨大感染力和价值特质。在他看来,艺术是拯救现代世界危机的唯一途径,而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无疑是拯救现代世界危机的最好方式。这是因为戏剧在高潮部分的体现,更能充分展示生活与本质的统一,集中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卢卡奇还发现了现代戏剧样式的不少问题和悖论,诸如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分裂、审美与伦理的疏离、自然性与自由伦理的对立等,指出现代戏剧面临着严重的自身发展的危机和中产阶级文化危机。

赫勒在卢卡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基础上就审美现代性、戏剧、喜剧的形式结构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她对社会与审美现代性危机、结构性机制、功能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现代社会审美在现代与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结构关系。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区分了技术想象、历史想象两种制度,指出现代社会就是由这两种想象制度建构起来的。在她看来,技术想象制度在现代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历史想象制度是一种抵制技术想象制度的制度,带给我们历史真理与意义。只有这两种想象制度都发挥作用,在现代社会才可能过上一种好生活。赫勒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时间组织元素的分析颇为精彩,将其细分为时间密度、时间速度、时间张力、时间摇摆、时间停顿等多个层面,认为这五种时间组织元素构成了戏剧的情节,并通过情节的组织安排内化于戏剧情节

① 傅其林:《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页。

② 杨大春:《现代主义与当代主义——从福柯的视角看》,《河北学刊》2020年第5期。

③ [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下),徐恒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760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2页。

当中。她对喜剧本质的分析也很深刻。她认为喜剧既有同质性,也具有异质性,不同喜剧样式既在人物结构类型上存在重复性和稳定性,也在喜剧样式、理论元素、取笑对象方面存在差异性。为此,她把喜剧现象纳入历史哲学视野中进行考察和重构,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建构了具有后现代主义异质、多元色彩的喜剧理论。

捷克斯洛伐克的穆卡洛夫斯基、科西克、斯维塔克对形式、结构、功能符号美学的探讨也卓有成效。20世纪30年代,穆卡洛夫斯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历史、对立统一的方法论运用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最终从一名结构主义者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国内学者高树博指出:“穆卡若夫斯基(即穆卡洛夫斯基——笔者注)使自己既区别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而带有明显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又区别于庸俗的文学社会学,而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色彩”。^①穆卡洛夫斯基用“结构”代替“形式”一词,极力克服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艺术作品分析呈现出的原子化考察倾向,突破了俄国形式主义把研究限定在文学内部的理论局限,建立起一套历时的、动态的、嫁接自律与他律的结构主义理论。他把结构视为联结艺术与社会中介,把语言、文学、艺术视为整体或一个系统。从历史和社会角度考察结构的变化,把艺术类别及其内部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文学的演进其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不同结构类别的结构演化,体现为作品形式结构的更替,以及作家个性与传统、习俗的交互动,系列之间互相影响。穆卡洛夫斯基的结构功能美学特别重视结构系统的研究,诸如他提出的“前推”功能概念,认为诗歌语言是对标准语言、规范语言、“程式化”的系统违反、扭曲,并被凝聚为一个“多样统一”的整体而呈现出来。穆卡洛夫斯基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之间

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奠定了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发展基础。此外,科西克对喜剧符号学的研究也别具一格。在他看来,言语和笑不是人类存在的附属物,而是其构成性元素。笑具有重要的社会批判功能,是对异化的批判和对人性真理的肯定,是对社会丑恶、不合理问题的揭露。斯维塔克的戏剧人类学文本分析也很精彩。在他看来,《俄狄浦斯王》代表了人对混沌宇宙理解的一种最初理性模式,而《哈姆雷特》则是最完整、最完美地体现了将人视为理性之物的一部悲剧。反观布莱希特的戏剧,又体现为人作为个体干预历史和自己生活的实践活动,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人类学历史模式。

波兰的丽莎·科拉科夫斯基对音乐符号学、戏剧符号学也作了很多文本研究。丽莎在音乐符号学的研究上贡献良多。卡冈曾指出,丽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研究像音乐这样复杂的现象时也使用了心理学、社会学、结构征候学研究中的概念和方法”^②。丽莎深入考察了音乐的类型及其意义的多解性、音乐的阶级性与民族性、作为空符号的静默与休止等问题。在她看来,“音乐是一种多语义的传达物,也就是说,是非单义性的,它完全可能以多种方式被‘理解’”^③。其原因在于多义性不仅能使音乐的意义更加具体化、实例化,充满表现力和欣赏性,而且能极大丰富音乐的体裁及形式。相反,“单义的音乐”最终只会成为公式化的体现和“二流作品”。同时,音乐文本既是阶级性和非阶级性的有机结合体,同时也是民族的传统性和开放性结合的产物。这几种动力性因素或力量有机融合在音乐文本当中,不断生成并经常发生演变或变革,推动着音乐的创新性发展。她还指出,作为“空符号”的静默、休止、停顿等在音乐中有其特殊性,它们不是音乐的“空白”,反而赋予音乐更加丰富的意义和张力,让乐句和乐曲变化多端,显得空灵、辽阔和神

① 高树博:《穆卡若夫斯基在中国》,《中外文化与文论》2015年第2期。

② [苏]M.C.卡冈编:《马克思主义美学史》,汤侠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③ [波]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新稿》,于润洋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秘。此外,科拉科夫斯基也从异化、二元对立等视野重新解读柏格森的喜剧理论,认为喜剧在于揭示其对象行为的非生命特征,包括喜剧对象的行为机械性、异化等,使欣赏者在确认真实生命和人性存在的同时产生笑。

四、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理论贡献与启示

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交往、语义、形式结构等不同维度推进语言学、符号学批判,坚持以开放的姿态与国际化视野推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理论批判与反思,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教条主义等存在的问题多有批判,但自身也存在僵化、教条、主观化、政治意识形态化、非马克思主义化等问题。对这些成绩和问题进行检视,对于全球化、符号化背景下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无疑具有借鉴和启示价值。

首先,由东欧马克思主义率先开启的符号学美学研究,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于20世纪早期就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小说、戏剧的形式,在其《现代戏剧发展史》(1911)、《心灵与形式》(1911)、《小说理论》(1916)等著作中,率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穆卡洛夫斯基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结构主义美学进行改进,也走出了一条从结构主义通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路。与之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盛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像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布迪厄的语言交换经济符号学、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符号学、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理论、詹姆逊的“社会的象征(符号)行为”、克里斯蒂瓦的女性主义符号学等,兴盛时间较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晚了近半个世纪。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兴起稍早,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巴赫金为代表的

苏联学者才首次提出了以对话、交往等为鲜明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思想。

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近百年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几经碰撞交流,既有激烈的批判对抗,也有理论上的借鉴吸收,更有多元化的融合创新,甚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流派。关注与参与研究的学者之多,形成的理论形态与样式之多,所撰写的文献著作之多,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之大,都不容忽视。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建构了“社会实践与交往符号学”“信息最优化理论”“辩证意义理论”“结构功能美学”“审美形式符号美学”等异常丰富多元的理论形态,涌现了一大批享誉世界、影响甚广的学者及理论流派,诸如以穆卡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学派,以沙夫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①,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先后出版和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著作、论文上千部(篇),理论成果极其丰硕,使20世纪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呈现出极其繁盛的局面。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开放的知识话语与国际化语境中推进美学之思,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论视野,产生了世界性影响。20世纪以来,东欧国家在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语境下,各种理论思潮在这里不期而遇,多次发生碰撞和交流,奠定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兴盛的基础。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身处这样一种文化语境,深受东西方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形成了较为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和研究态度。比如卢卡奇曾游学德国、苏联等不同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在与德国的布莱希特、苏联的拉普派和日丹诺夫正统派学者的论辩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穆卡洛夫斯基与俄国学者雅格布逊共同创立布拉格学派,在吸收借鉴俄国形式

^① 由波兰的沙夫所引领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欧洲学派”的其他成员还包括非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诸如意大利等国的费鲁乔·罗西-兰迪、杰夫·伯纳德、奥古斯托·庞其奥、苏珊·佩特里利等学者。

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方法论的基础上建构了结构功能美学,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社会学研究;马尔科维奇是英国著名语言哲学家艾耶尔的学生,马尔库什是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塞勒斯和逻辑学家奎因的学生,两人都深受欧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影响。即使在 20 世纪后期,东欧马克思主义在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下,也与世界学术前沿保持着频繁的对话与交流。比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实践》和《实践-国际》杂志、科尔丘拉夏令学园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学术交流平台。此外,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符号学美学研究过程中,还注重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专门术语和概念,包括数学、控制论、信息论等,实现了学科交叉与话语融合。总体而言,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植根于深厚的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土壤当中,致力于寻找解决本国政治、经济及其文化困境的办法,不仅深受布洛赫、弗洛姆、戈德曼、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影响,而且深刻吸收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思想,充分彰显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研究风格和强大阐释力。

在全球化、信息化、符号化时代背景下,全面检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成绩与不足,对于加快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深入发展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整体把握国际马克思主义美学及其世界符号学发

展动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赵毅衡指出:“与符号学结合最顺理成章的是马克思主义。两者结合首先推动了符号学的社会学研究。”^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面向当代社会,特别是面对当代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理论幻象、学术话语、实践活动和经验事实的情况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和立场考察符号世界,注重考察符号的实质及其实践性、社会性与历史性,揭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对人的发展作用等。应该说,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与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理论处境、批判维度、理论走向等方面都有诸多契合之处,很有关注和借鉴学习的必要。傅其林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符号学维度批判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阐释活力和有效性。东欧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特殊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之间发生了大量的碰撞交流,形成了极为繁盛的理论形态、极具创新性的理论批判范式、极为多元的理论批判维度,走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创新研究的前列。辩证地看,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也有诸多缺陷与不足。但不管怎样,近百年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发展进程中作出的一系列的理论努力和尝试,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值得国内学者批判性地接受。

① 赵毅衡:《符号学的一个世纪:四种模式与三个阶段》,《江海学刊》2011 年第 5 期。

On the Critical Dimension of Marxist Semiotic Aesthetics in Eastern Europe

KUANG Cun-jiu CHEN Jun-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Sichuan 625014, China)

Abstract: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focuses on advancing the study of Marxist Semiotics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social practice, humanitarianism and structural function. I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criticism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e, pays attention to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semiotic signification, grasps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function, and has constructed the unique hermeneutic style and critical paradigm of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semiotics,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emiotics Aesthetics of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can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Semiotics in China.

Key words: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semiotic aesthetics; critical dimension;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